

# 洪宪帝制

——袁氏帝梦破灭记

张华腾 著

中华书局



## “大史记书系”出版缘起

中国古代的史书有多种体裁，有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纪传体，有以时间先后为序纪事的编年体，有以完整记录历史事件的纪事本末体；还有典志体、会要体、纲目体，等等。这些体裁也同样适用于历史普及读物。比如，我们推出的以阎崇年著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为代表的“正说历史书系”（共计十种），以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帝王为基本线索，把主要历史事件贯穿其中，从体裁来看即可归入纪传体。这样做的好处是线索简明，易于读者了解和认识一个王朝的概貌。但限于体例和篇幅，对于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，无法作更深入细致的介绍。有鉴于此，我们策划了这套“大史记书系”。所谓“大史记”，就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述。若从体裁来分，恰好可以归入纪事本末体。具体来说，就是选择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或转折意义的大事件，不仅介绍其经过，而且关注其影响，并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舞台，让众多的历史人物在这里表演，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其命运，窥见其人性。

本书系计划首批推出五种，即《安史之乱》《靖康之变》《永乐迁都》《太后垂帘》《洪宪帝制》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继续得到读者的喜爱，也诚恳地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7年4月



## 自序

说起袁世凯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在很多人眼中，袁世凯的身份就是乱世奸雄、告密者、窃国大盗、卖国贼等。他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格更不为人们所认可。在晚清，他曾出卖过两个皇帝，并以此为自己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：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皇帝，博得了慈禧太后、荣禄的青睐，为其官运亨通开辟了一条捷径；辛亥革命中出卖宣统皇帝，更使他戴上了临时大总统的桂冠，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。进入民国后，他又违背总统誓言，背叛民国，走上帝制自为的不归路。

其实，袁世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，除了上面所说的，还有他的另一面。

清末的袁世凯曾经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改革家。比如，甲午战后他学习西方，练新军，变军制，进行军事改革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，促使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道路；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，连上数折，促使清廷废除了自隋唐以来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，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；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，在所辖地区大力推行新政，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“模范省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武昌起义后，他顺应共和潮流，与革命党人联手，共同推翻清王朝。即使在任大总统期间，他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，也注意发展经济，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……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。

为什么袁世凯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那么差，以至于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也被抹杀？其中的一个关节点就是他复辟称帝，即所谓“洪

宪帝制”。如果没有洪宪帝制的发生，即使袁世凯在道德上有再多的缺点，人们也会原谅他，对他的评价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正如我的老师复旦大学姜义华先生所说，如果袁世凯在逼清帝退位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去世，那么他“必以结束二千年帝制、缔造共和的一大勋臣彪炳于史册”。

复辟帝制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，也是最大的污点。恢复帝制使他名誉扫地，并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，羞辱而死，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。

1912年1月1日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。2月12日，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随着清帝的退位而覆灭。3月10日，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中国南北统一，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民主共和的新时代。受尽专制之苦的中国人民喜不自胜，对国家、对民国政府寄予无限希望。对中国的未来，人们无不有着美丽的憧憬，西方人经过几百年发展创立的现代社会，一夜之间就要在中国实现了，人们欢欣鼓舞，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。

然而不久，人们的期望就破灭了。袁世凯执政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，没有沿着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政党、国会解散，宪法被撕毁，民主被践踏，法制被破坏，人们翘首以待的竟然是帝制的复辟，皇帝的再现。历史就喜欢捉弄人，民初社会的发展好像跟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。

如何解读洪宪帝制？这不仅是当时人所思考的大问题，更成为后世史学家探讨的重点。然而，九十多年以来，人们大多认为，复辟帝制

完全是袁世凯野心所致，他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就准备复辟，实行帝制是其既定方针。但这种解读具有片面性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过分夸大了个人的历史作用。

经过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，完全是欧美政治体制的移植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，民主政治体制最终在欧美确立并逐渐成熟，将它移植到中国，并期望完全适应中国国情，是不切合实际的。中国的政治土壤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，对西方的文明成果应有一定的适应期。中西政治文明必须经过激烈的碰撞，相互适应，相互影响，才能融合在一起。民国初年就是这样一个碰撞的时代，思想混乱、社会无序等，也就成了必然的现象。与刚刚被否定和打倒的旧传统相比，人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民国不如大清，传统比现代好，这也是复古思想产生的根源。

因此，袁世凯复辟帝制既有他个人的因素，更重要的是民初复杂政治形势演进的结果，同时，又是当时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产物。德国、日本、英国诸列强，都与帝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就没有洪宪帝制，洪宪帝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。

洪宪帝制是一场非常复杂的矛盾运动，作者力图通过对洪宪帝制的全面解读，阐释袁世凯称帝的多种因素，包括国外、国内、主观及客观等诸方面；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详细描述帝制演进的过程及结局，尤其注重对各政治人物及势力对帝制态度的叙述；并根据作者的认知，分析帝制失败的原因。在此基础上，尽量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来观察这

一重大事件的发生、发展和结局；在谴责袁世凯的同时，给予更多的理性思考，而不仅仅停留在发泄情感的感性层面。

张华腾

2007年4月16日

## 引子：一则美丽的谎言

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奇动物，中华民族的保护神。龙主宰天下，漂泊不定，时而天上，时而地下，时而海中，人们爱之敬之惟恐不力，以至于哪里发现了龙的行迹，那里的老百姓肯定要烧香祷告不止。千百年来，龙的故乡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龙的故事，龙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龙成为封建皇帝的象征和专利，某人能否取得皇位，要看他是不是真龙天子。在二十四史以及民间传说中，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。

袁世凯称帝，也有很多关于龙的故事。

1915年夏天，袁世凯正为自己是否称帝而犹豫不决，一个偶然事件坚定了他的信念，决心沿着帝制的路子走下去。

袁世凯自入住中南海之后，尽管内政、外交事务缠身，但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，每天都要午休，雷打不动，午休过后一杯香茶，精力旺盛，批阅公文效率极高。这天下午2时30分左右，是袁世凯午休将醒的时候，茶童将泡好的香茶端进了他的卧室。不知为什么，这天茶童心事重重，手中的托盘不觉间失去了平衡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茶杯滑落在地，摔得粉碎。这个茶杯非同寻常，用上等碧玉雕刻而成，是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的时候，朝鲜国王赐予的。响声惊醒了袁世凯，他大吼一声从床上坐起，斥责茶童：“怎么回事，毛手毛脚。来人！”

毕竟是大总统的茶童，精明机智，他跪在袁世凯前面说：“总统，我……我看见……”

“看见什么？快说！”

“我不敢说。”茶童战战兢兢。

“快说，看见了什么！”

“刚才我看见床上不是大总统，而是一条五爪金龙，闪着金光，我吓得走神，才将茶杯摔落在地。请总统宽恕。”

“哦。”袁世凯心中窃喜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顺手从抽屉中拿出几块银元递给茶童，说：“这事不准张扬出去，只能闷在肚里。去吧！”

茶童走后，袁世凯在房里踱来踱去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看来我是真龙天子，命里注定了。”

一个美丽的谎言，坚定了袁世凯称帝的最后决心。

这则故事是袁世凯死后从中南海传出来的，其真实与否无法考证。但袁世凯具有极其严重的迷信思想则是事实，这种思想与权力欲结合起来，成为他最终称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# [蠢蠢欲动



- 排斥异己：民国伟人靠边站
- 共和难寻：民国仅剩一具躯壳



## 排斥异己： 民国伟人靠边站

1912年3月10日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4月1日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，随后临时政府北迁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正式成立。由于清王朝是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、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、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其他反满势力的联合作用下被推翻的，所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最初是各派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。

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成立，给人们以极大的刺激，人们对新生的共和国、对袁世凯寄予莫大的希望，他们非常兴奋地说：“推翻四千余年之专制政体，而易建共和，实为我国历史上一重大转变”，“在此革故鼎新，人多朝气，内而台阁，多属名流，外而封疆，多属首义，一时物议，庶几长此可以久安，目前可以图治”。如果袁世凯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，顺应民心，与革命党人及各派政治势力携手合作，励精图治，共谋建设大计，那将很可能创造一段辉煌的历史。但是袁世凯不仅没有这样做，反而为确立其独裁专制政权，对不同政见者分别采取排斥、打击甚至消灭的政治手段。曾几何时，创建民国的功臣或靠边站，或被监禁，或被赶出国门，飘泊海外，甚至有的做了专制政权的刀下之鬼。失去



袁世凯像

了监督体系的制约，失去了不同政见者的制衡，袁世凯才能够为所欲为。

### 逼走总理唐绍仪

1912年6月15日上午，国务总理唐绍仪轻车简从，急速赶往前门车站，乘上一列东去的火车。至天津下车后，住进利顺德饭店。第二天，唐绍仪以电报的形式向大总统袁世凯请假：“绍仪现因感受风寒，牵动旧疾，恳请给假五日，赴津调治。唯总理职务关系重要，不容一日旷废，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。”袁世凯闻讯，立即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、陆军总长段祺瑞先后赴津，劝说唐绍仪回京。唐绍仪执意不肯，并说：“若要留我，只好用棺材来吧。”

唐绍仪挂冠而去，国务院一时无主，而国务繁忙，内政、外交都非常棘手，容不得半点松懈。这一新闻经媒体炒作，就像一锅热油中注入了一桶水，在北京政坛上顿时炸开了。有的说唐绍仪为“东西大政治家”，有的则说他“擅离职守，乘间潜逃”。唐绍仪为何挂冠而去？熟知内情的人说，这是唐绍仪的无奈选择，他和总统袁世凯的矛盾激化到了极



唐绍仪像

点，已经无法调和。唐绍仪是袁世凯的朋友和僚属，辛亥革命以前一直追随袁世凯，他们的矛盾从何而起的？这还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。

唐绍仪（1861—1938），广东香山人，清政府派遣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，1881年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，因顽固派的极力反对，清政府中断了这项留学计划，唐绍仪被迫回国。第二年，唐绍仪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、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

朝鲜,与同一时期被派往朝鲜的袁世凯相识,并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。不久,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,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驻外大使,但其职责、名分要比大使高得多,因为这时的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,袁世凯代表清政府,负责维护中国在朝鲜的利益,协助朝鲜国王处理外交和内务。袁世凯上任后,立即让唐绍仪做了自己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,实际上是袁的副手。在袁世凯驻扎朝鲜的十余年间,两人配合默契,积极主动,惨淡经营,在外交上折冲樽俎(zǔ),有效地制止了日、英、美、俄对朝鲜的渗透,维护了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。袁世凯后来巡抚山东、总督直隶,都把唐绍仪带在身边,以之为最得力的僚属和助手。

袁世凯曾高度评价唐绍仪的才能,说他“才识卓越,血气忠诚,谙练外交,能持大体,洵为洋务中杰出之员,环顾时流,实罕其比”。所以对唐绍仪不断提拔,使之从一个品级低微的幕僚,逐步升迁至外务部侍郎、邮传部侍郎、奉天巡抚、邮传部尚书,成为清政府的一品大员。1909年初,因袁世凯势力的高度膨胀,威胁到清廷的统治,与满洲少壮派贵胄的矛盾激化,清廷将其罢免。唐绍仪也因此遭到打击。直到辛亥革命爆发,唐绍仪在清政府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。可见,唐对袁的依赖非常明显,可谓是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

武昌起义后,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。重新出山后的袁世凯充分施展其狡黠政治家的特有手段,一方面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声威,迫使清廷将军政大权交给他;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人则软硬兼施,命冯国璋率北洋军攻克汉口、汉阳,以炮火威逼武昌,然后又向革命党人摇起橄榄枝。这样,南北双方开始了议和活动。

1911年12月18日南北议和正式揭幕,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谈判总代表,显示了对唐的极大信任。唐绍仪毕竟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,到上海后,在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感召下,思想发生了变化,开始倾向于共和。在第二次双方会议上,唐绍仪说:“共和、立宪,我等由北方来者无反对之意向”,“不过宜筹一善法,使和平解决,免致清廷横生阻力”。唐绍仪态度的变化,为南北尽快达成协议,为南北统一

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为当之无愧的民国功臣。唐绍仪由此也赢得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尊重，后来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，孙中山主盟，加入同盟会。

南北议和，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，袁世凯因赞成共和，被举为大总统。1912年3月10日，袁世凯在北京就职。就职的前一天，即3月9日，他致电孙中山，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人选。论私交，唐绍仪是袁世凯患难与共、莫逆之交的朋友，多年来为其部属；论才能，唐也是北洋派中的佼佼者。虽然议和时唐倾向南方，但毕竟是北洋班底中的重要人物，而唐与南方接近，更容易得到由南方控制的参议院的通过。可以说，提议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，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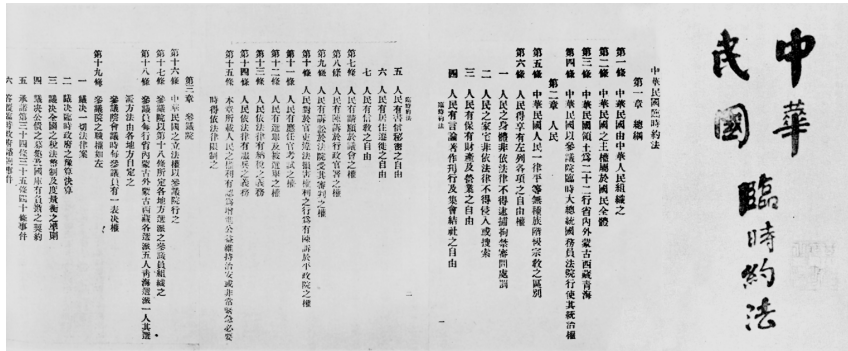
3月29日，以唐绍仪为总理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正式成立。唐内阁由南北各方面人物组成，代表各种势力。陆军（段祺瑞）、海军（刘冠雄）、内务（赵秉钧）三部总长为袁系人物，外交（陆征祥）、财政（熊希龄）二部总长分别属无党派和立宪派人士，教育（蔡元培）、农林（宋教仁）、司法（王宠惠）和工商（陈其美）四部总长为同盟会人物。由于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，同盟会人物又在内阁中居半数，所以人们称这届内阁为“同盟会中心内阁”。

乘辛亥革命的时代际遇和当时的历史条件，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唐绍仪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，这对患难与共的朋友，登上了中国统治权力的最高峰。但也就是从这时起，袁、唐矛盾产生并不断激化起来。

袁世凯认为，唐绍仪“自朝鲜共患难，以至北洋为堂属，北京为同僚，故能如身使臂，如臂使身”，现在唐任内阁总理，不过是自己的幕僚长而已，期待着唐仍像过去一样忠于自己，惟命是从。他准备采取各种手段，分化、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，确立北洋势力在全国的统治。正如时人所说：“袁始终不能化除畛域，高掌远蹠，转以‘北洋’二字自限。”

而在唐绍仪看来，清朝覆亡，民国成立，自己可以一展才华，致力于民国的建设，所以他“欲以庚子前后所以助袁者继续辅袁，以致致力于国，为大局图久安之策，故最大宗旨，即图孙、袁之合作”，认为“今日国家大

事,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;而欲治理中国,非项城诚心与革命党合作不可”。他确信自己和袁世凯有近三十年的交谊,和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则是同乡,自己又加入了同盟会,能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。因此,他按照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度,承担起责任内阁的重大责任。



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

所谓责任内阁制,就是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,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,总统虽有极大的权力,比如任免文武官吏、发布法律命令等,但必须经由内阁副署,才能发生效力。唐绍仪“事事咸恪遵约法”,对袁世凯大加限制。例如,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,袁世凯出席并发表讲话,而袁的讲话稿,就是经过唐绍仪的改删而最后定稿的。对总统府的决定,唐绍仪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,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和袁争得面红耳赤。他总是说:“责任内阁,凡事要对国家负责。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。”唐绍仪的举止使袁世凯大为恼怒,对这位老朋友不仅失去了信任,而且怀疑唐在以南方革命党为后盾,有独树一帜之意。一次在与唐绍仪谈话时语带讽刺地说:“少川(唐的字),吾老矣,你来做总统吧。”

唐绍仪所为是为维护制度和法律的尊严,在我们今天的人来看是非常正常的,但在20世纪初,在中国由专制转向共和的初期,则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更何况唐绍仪长期作为袁世凯的僚属,对袁惟命是从,现在改行共和,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,袁世凯不好接